

烽火完達山

李明顺口述
雷再润整理

辽宁人民出版社

7251/31

烽火完達山

李明順 口述

雷再潤 敕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陽

烽火完达山
Fenghuo Wandashan

李明顺 口述

雷再润 整理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

字数：152,000 开本：787×1092 $\frac{1}{16}$ 印张：7 $\frac{1}{2}$ 插页：2

印数：1—22,5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 慧 责任校对：张金英
封面设计、插图：秀 中

统一书号：10090·371

定价：0.64元

前 言

一九八〇年夏天，我访问了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基地之一的宝清县。

当车开进三江平原向南疾驰时，那高耸宏伟的完达山横亘天际，遮住了遥望的视线。它郁郁葱葱，莽莽苍苍，绵延几百里，矗立在宝清、密山、勃利三县之间，成为当年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地方，成为三江人民同日寇作战的天然屏障。我望着那烟雾沼沼的重重山峦，看着这一座座披翠挂绿的山岗，宛如离别故乡多年的游子一眼望到了亲人，思潮顿时翻腾不息，把四十多年前在这里燃烧的革命烽火，从记忆的底层一一浮现出来。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在东北军张作相部当排长，目睹了日寇入侵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出于爱国和对日寇的仇恨，我从叛变投敌的队伍中拉出一排人，插入完达山，同日寇、汉奸展开了血与火的搏斗。

一九三五年春天，赵尚志同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四团来到了宝清，我即率领这支自发的抗日队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二年，四团扩编为四师，我的游

击营也扩编为三十二团，我任团长。先后在三军四师师长郝贵林、五军参谋长王效明、政委季青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转战在宝清、密山一带山区，壮大了队伍，打击了敌人，成为一支有影响的武装力量。

一九三七年春，日寇为推进其侵华战争，扩大统治地盘，在完达山区开始实行“归屯并户”政策，把山区的人民统统赶下山来，圈在“集团部落”里，用警察或自卫团看守起来。从此，我抗日联军的处境日渐艰难。到一九三八年冬，我三十二团失去群众的支援，供给断绝，队伍里又出了叛徒，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山林里，濒临绝境。在此形势下，我们凭着抗日救国的坚强毅力，突破重围，把队伍撤到了中苏边境的苏联一侧。一路上，且战且行，到达目的地时，仅剩三十五人了。

人少了，但抗日的烽火并未熄灭。我把同志们作了适当安置，就带领一支小部队回到东北，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进行了七年敌后斗争。在此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十四年的抗日救国斗争中，我三十二团的指战员获得无数次的战斗胜利，享受过胜利后的喜悦，也经受了多少次艰险挫折，倍尝着失去战友、亲人的悲哀与痛苦。正是胜利与失败的交织，喜悦与悲痛的融合，构成了我们抗日到底的决心，鼓舞和鞭策着我们渡过了东北抗日斗争史上的艰难岁月，终于迎来了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在胜利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想起十四年的战斗历程，

思念为抗日而牺牲的战友和同志，深感胜利来之不易！每当这时，我就总想写点东西，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教育后代，缅怀先烈。但因忙于工作，终未如愿。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同所有抗联老同志一起，遭受了残酷折磨。不要说写革命回忆录，就连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也被颠倒、篡改，成了“四人帮”的爪牙、亲信们鞭笞我、拷问我及至把我关押起来的“罪证”。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和辽宁省委很重视党史资料的“抢救”工作。在此情况下，我决心在有生之年把我三十二团以及与之有关的抗日战争事实写出来。应我个人请求，辽宁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派雷再润同志将我口述的事实，整理成了《烽火完达山》这本小册子。

在我访问宝清的第二年，我爱人周淑玲和雷再润同志再次访问、考察了我三十二团战斗过的地方。我们两次访问，都受到了当地党政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尤其是宝清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原抗联五军政委季青同志不仅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讲了许多重要的抗战事实，而且对写书提了指导性意见。当年同我一起参加牡丹江战役的姜德同志，在接收宝清的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的赵鸿丰同志，带领我去接受鸡西的原东安地委副书记白如海同志，还有光复后在鸡西组建东进委员会的陶宜民同志，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谨此深表感谢！

我已八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所写的事实尽管经过调

查核实，但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难免有误。诚望读者，特别是抗联的老同志，予以批评指正！

李 明 顺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

2080/20

目 录

一、上山抗日	1
二、火烧警察署	11
三、全歼自卫大队	16
四、夜攻专卖局	24
五、智取“木营地”	29
六、周庆山和他的侄女	35
七、加入抗联	41
八、夜会邓警尉	47
九、“李山东”大义凛然	56
十、掩护薛副官	63
十一、探宝清遇险	70
十二、龙头山下遇敌兵	82
十三、攻克小城子	90
十四、狼洞沟突围	97
十五、关门山上过大年	103
十六、“烈士山”激战	113
十七、戴焕章铁心抗日	125
十八、枪毙劝降人	142

十九、撤向国境线·····	151
二十、小部队的艰难岁月·····	159
二十一、我的两个“把兄弟”·····	165
二十二、三次遇险·····	172
二十三、智歼群敌·····	181
二十四、黎明前的战斗·····	187
二十五、进退宝清城·····	201
二十六、烽火鸡冠山·····	207
二十七、深山剿匪·····	222

一、上山抗日

一九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此，日寇妄图变我东北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在东北辽阔的土地上展开了。九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共满洲省委，相继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宣言，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和东北爱国军队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之后，又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到人民群众和爱国军队中，组织和发动抗日斗争。在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领导下，抗日的烽火迅速燃遍了白山黑水之间。

但是，在这关系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蒋介石不但不抵抗，反而叫嚷“攘外必先安内”，一方面，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另一方面，公然引狼入室。就在日本关东军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的时候，蒋介石反动政府竟然训诫东北各地驻军“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致使沈阳城一夜沦陷，几天之后，辽、吉两省落于日寇之手，整个东北大好河山很快踏遍了日军铁蹄，东北人民顿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狂嚣：“我们可在三个月内完全占领中国领土”。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则歇斯底里叫喊：“我们要四个钟头占领上海，二十四小时占领南京”。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东北军吉林军区二十六旅六七五团五营二连当兵。我们团驻防在牡丹江南的铁岭河一带。

事变的消息传来后，东北军广大士兵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与日寇决一死战。东北军士兵大都是东北人，一听说日寇占领了自己的家乡，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有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流着泪找到营长、团长，诉说保家卫国的决心，要求开往前线消灭日寇。我不知道日军入侵东北的数目，后来听说才有一万多人。可我们东北军有二十多万！我想：“没事，日本鬼再强，我们再差，二十个对付它一个，还对付不了吗？”

可是没过几天，就听说日寇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主要城市，没过几个月，竟然窜到了哈尔滨。这时，士兵们有的咬牙切齿，痛恨日寇嚣张；有的在唾骂蒋介石政府卖国；有的惶惶然为个人和军队的前程担心……这时，我才弄明白，日寇所以进犯得这么快，就是因为蒋介石卖国政府下了“不抵抗”的命令。

“我不明白，外国人到中国杀人放火，为什么不许中国人自卫？蒋介石不许抗日，是不是他得了日本人的好处？”我想不通就问。队伍里也有有文化、知多见广的人，他们偷偷告诉我：蒋介石把军队调往关内对付共产党，把东北让给日本人了，这就叫“攘外必先安内”。啊，原来是这样！从此，我逢人就讲，使许多人认清了“不抵抗主义”包藏的祸心。于是在士兵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坚决主张抗日的势力。

旅长邢占清顺应人们的正义要求，决心与马占山等人一

起率队抗日，守住哈尔滨。

但是，团长赵秋行在日寇步步进逼、东北军连连败退的情况下，先是消极动摇，后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投靠了大汉奸熙洽，干起了卖国求荣的勾当。

熙洽姓爱新觉罗，是清朝的“闲散王族”，是搞清朝复辟活动的宗社党头面人物。“九一八”事变前，他曾任张作相部参谋长兼吉林省政府委员。事变的第三天，他就派人拿着他的密函向日寇表示投降，把吉林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日本人给了他一个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的头衔。由此，他变成个出卖民族的败类。赵秋行就充当了这个败类的忠实走狗。

赵秋行投降日寇，严重地影响了六七五团官兵的士气。我想，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敌人打来了，我们不去保家卫国，反而帮敌人来对付老百姓，这不是丧尽天良吗？我曾暗下决心脱离这支队伍，独树抗日旗帜。后来，因为营长英占彬坚决主张抗日，串通了几个抗日坚定分子缴了团部人员的械，防止了赵秋行策动全团投敌，我才又安下心来。

不久，吉林二十六旅改为自卫军，旅长邢占清当了师长，营长英占彬晋升为旅长，有个外号叫“张铁嘴子”的当了我们的团长，我也当了排长。之后，我们团在哈尔滨、巴彦、依兰等地，同汉奸于芷山的队伍进行过多次战斗，虽然胜多负少，但我团的战斗力受到很大损伤。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寇进逼哈尔滨，邢占清调我们团去保卫哈尔滨。当我们到达哈尔滨市郊时，已是二月初，中国

军队正在吉林自卫军总部指挥下，与日寇展开激战。由于汉奸张景惠等人的破坏和我军没有构筑坚固的工事，在敌人强大的立体攻势下，我们坚守了两天后，败退下来。从哈尔滨退到呼兰河，然后经巴彦、新甸、木兰等地，迂回到了依兰县，在一个名叫粉坊的村子里驻扎下来。

我们的队伍虽然驻扎下来了，但因一路败退，心绪并未安定，军纪糟糕到了极点，要吃要喝，见鸡抓鸡，碰猪宰猪，老百姓遭了大难。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难受，对我排的弟兄们说：“我们打了败仗，保卫不了老百姓，已经丢了脸，再乘机熊老百姓，这和土匪有什么两样！”我告诫大家：“谁要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要军法论处！”因此，我队伍里没有敢胡作非为的。

有一天，我排的一个士兵突然问我：“排长，你听说没有，团长正在策划率队投降日寇？”

这个消息，象晴天霹雳一样，震动了我。我立刻在队伍里作了深入了解，证实确有其事。

夜深了，弟兄们躺在老百姓的土炕上早已进入了梦乡，而我却翻来复去地睡不着。从赵秋行投敌后我的表现看，“张铁嘴子”深知我是坚决抗日的，他要投敌，肯定不会饶过我和我排，他甚至会首先把我这个排的人除掉。我闭着眼睛琢磨着对付他的办法。我想：带着弟兄们来个突然袭击，把他干掉吧，可他尚且没有叛变的行动，担心打虎不成反被伤；不下手吧，又怕他一旦宣布投敌，我们后悔就晚了。想到这儿，我心如火燎，猛然翻了个身。

“排长，想家了吧？”躺在我身边的陈友才，被我碰

醒，悄声地问我。他原是朝阳区六家子村人，为生活所迫逃荒到了吉林省磐石县一个山沟里。仍生活不下去，才当了兵。他为人耿直、豪爽，我们俩处得很知心。

我哪有什么家可想啊！九岁那年，我的父亲劳累而死，随母亲、姐姐讨饭谋生，十三岁时，就给有钱人家扛活，种种非人的待遇，使我无法忍受，遂于十九岁那年，只身离开了山东老家，讨着饭徒步到了哈尔滨。在这里，为资本家摆船、背纤。艰辛的生活，象滔滔的松花江一样没有尽头。

我是这样，广大黎民百姓，也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寇侵占东北后，人民群众遭受蹂躏的情景更是惨不忍睹！

想到这儿，我决心抢在“张铁嘴子”行动之前把队伍拉出去。于是，我悄悄地同陈友才谈了想法，合计了拉出去的具体方案。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以出早操为名，把全排人集合起来，拉着队伍出了村。一阵急行军，离开驻地就是十几里。我选择了一块荒僻的地方，让大家坐下来稍事休息。这时，士兵们个个累得气喘吁吁。我故意问：

“怎么样，弟兄们，累不累？”

“排长啊，”士兵们说，“再累也心甘，这是做人的路啊！”

“对，”我鼓励大伙说，“我们就是要堂堂正正做人，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不能让子孙后代骂我们！我们要追得鬼子狗趴兔喘。”

弟兄们听我们这么一说，精神顿时更加振作，有的笑着

问：

“就凭我们这几杆烂枪，还有那个时候？”

“能不能赶着鬼子跑，不在于我们这几杆烂枪，而在于有没有中国人的骨气！”我站起来，打着手势说，“现在有人手中有一团的兵力，不去打日寇，却在暗中策划投降敌人！这种人没有骨头，枪再好，也不过是只癞皮狗！”

弟兄们一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心中已猜着了八九分。有一个性急气粗的士兵问：

“排长，你说这人是谁？咱们去收拾他！”

“前有赵秋行，已成了民族败类；眼下还有‘张铁嘴子’！”接着，我把“张铁嘴子”暗中策划投敌的事讲了一遍。弟兄们听了都很气愤，目光不由地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期望我拿出办法来。

看到战士们的情绪这样高涨，我想起了当时在东北军爱国士兵中流传的一支歌曲，我开了个头，大家跟着唱起来：

上起刺刀来，
弟兄们散开！
这是我们的国土，
我们不挂免战牌！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住了几百代；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不能让出来！

.....

唱完歌，大家的情绪更加激昂。我提高嗓门说：

“我姓李的是中国人，决不干出卖祖宗的事情！现在国难当头，愿意抗日的站过来！不愿意的不勉强！”我往地当央一站，立刻有二十几个人站到了我身边。也有几个人没动弹，强调家中有父母、妻子，放下武器回家了。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为防备“张铁嘴子”追击，我化名“田德”，拉起队伍向东进发。后来，人们习惯地叫我“天德”，把我们这支自发抗日的队伍叫“天德队”。

松花江两岸的平原地带，是日寇和汉奸武装比较集中的地区。在这里，我们这支小队伍很难站住脚。为了长期坚持下去，我们选定了完达山与三江平原交界的地区作为抗日活动基地。

我们一边战斗，一边向东进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到四月份，进入了横亘宝清、密山、勃利之间的完达山。

方圆几百里的完达山上，森林茂密，灌木丛生，栖息着多种飞禽走兽，生长着各种山菜野果；山下，是肥沃的三江平原，盛产大豆和小麦。发源于山区的挠力河、七星河、宝石河，水量充足，养育着肥美的鲑鱼；沿河两岸的低洼地区，是一片沼泽，栖息着水鸭、野鸡和雁类。“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谚语，就是三江平原物产丰富的真实写照。这种自然条件，既为抗日战士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设下了天然屏障，也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从此，我们以完达山和三江平原作战场，同日寇汉奸展开了生死的搏斗。

这期间，由于生活极度艰苦和屡遭敌人的袭击，弟兄们有的牺牲了，有的逃跑了，到达宝清西部山区时，我们三十几个人的队伍，仅剩五、六个人了，还常常几天吃不上饭。

有一天，我们又饿又累，躺在青龙山山坡上休息，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响，眼前冒金花。陈友才突然坐起来说：

“李哥，这样不行，咱们得想点办法活下去！”

“有什么办法，你说吧，我听你的！”

“那不是车吗？”陈友才指山下奔驰在大道上的四挂套大车说，“我们可以求车把式帮帮忙！”

我想，那个年月能拴起四挂套大车的，一定不是穷人，就同意了他的建议，下山把车截住了。我说：

“掌包的，对不起了，请把马借给我们骑几天吧！”接着，我跟他讲，“我们是抗日的队伍，用老百姓的东西讲借讲还，请你放心。”

掌包的中等个，腿脚有点瘸。他听我要卸他的马，急忙笑脸相迎地说：

“如今国难当头，支援抗日，人人有责。莫说用我几头牲口，就是有用我的地方，诸位也自管吩咐！我要为抗日出把力，正愁找不到你们呢！”说着，他从腰里掏出足有半块砖那么大的一个包裹，递给我说：

“老总你们拿着，这是五两烟土，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一看，这人够朋友，急忙通了姓名，原来他叫周国昌，是徐马架子村人。我表示谢意，把烟土收下，马也不卸了。他临走时，诚恳地说：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周国昌好交朋友。诸位如不